

Autumn 2011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September No.14

2011年9月 第十四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十四期
2011年9月

主编 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韩慧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编委会顾问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金德水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理事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nren Davaa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1年8月11日上午，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



P.05

→ 2011年8月21日，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开幕。

特稿

- 02 斯里兰卡总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成立的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
- 04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学术活动

- 05 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举行

研究进展

- 07 战略文化视角下中国对南亚政策分析
- 21 澳大利亚华文媒体与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文化的对比分析
- 24 越南的中国研究

研究机构

- 37 国际亚洲研究所



斯里兰卡总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成立的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

2011年8月11日上午，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

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阁下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办公楼配楼多功能厅举行。出席仪式的领导和嘉宾有：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斯里兰卡外交部部长佩里斯，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部部长迪萨纳亚克，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兰杰特·乌杨，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杨学义，校长陈雨

露，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杨秀萍，前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江勤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孙卫东，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曹文泽，党委副书记姜绪范、文君，副校长彭龙，校长助理孙友忠、杨建国等。斯里兰卡代表团成员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师生代表参加了学位授予仪式。仪式由党委书记杨学义主持。

陈雨露校长首先致欢迎辞，对总统一行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陈校长回顾了中斯两国深厚交往的历史渊源，介绍了北京外国语大学70年的办学历

程以及僧伽罗语专业的发展情况。陈雨露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斯里兰卡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合作，此次总统阁下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并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荣誉。总统阁下的北外之行一定能够激励中斯两国青年立足本职、放眼国际，在投身国家建设的同时，努力为沟通世界文化、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随后，陈雨露校长宣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同意授予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名誉博士学位的决定”，并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颁发名誉博士学位证书和斯里兰卡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聘书。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用僧伽罗语进行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国与斯里兰卡几千年来友好交往的历史，介绍了僧伽罗语的由来与发展，并对在场的僧伽罗语专业学生提出了希望。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表示，学习僧伽罗语对于加强中斯两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青年学有所成，祝愿中斯两国友谊万古长青。

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总统一行来到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办公楼二层新成立的斯里兰卡研究中心。陈雨露校长与总统先生共同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红色的绸缎徐徐拉开，标志着国内第一个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斯里兰卡传统的点灯及诵经祈福仪式结束后，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向中心赠送了珍贵的僧伽罗语书籍并向中国第一位僧伽罗语学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僧伽罗语专业的郑于中教授赠送了礼

物。陈雨露校长向总统先生赠送了博士服作为留念。随后，杨学义书记向总统先生介绍了中心的筹建情况和主要成员。

在新成立的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总统先生与中心的僧伽罗语专业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总统先生详细询问了中心目前的发展情况以及同学们学习僧伽罗语的点点滴滴，对学生们流利的僧伽罗语表示赞赏，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为中斯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活动结束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与僧伽罗语专业师生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网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为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揭牌，受到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网、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浙江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2011年6月20日上午，以传承亚洲文明、弘扬亚洲价值为宗旨的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成立。受聘为该中心理事长的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共同为研究中心成立揭牌。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是经韩国教育部登记注册的公益性教育组织。从2000年开始，财团每

年资助约50名来自亚洲国家的学者前往韩国进行研究，浙江大学近年来已有20多位学者受到资助。“亚洲研究中心”是该财团实施的项目之一，现已在亚洲建立了17个中心，中国有11个。新成立的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将亚洲图像资料作为主要研究材料，与以文字文献为研究材料的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互补，以“图像亚洲”为研究主题开展系列研究。

金德水书记在致辞中说，浙江大学一直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将它作为学校的四大使命之一。此次亚洲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也是亚洲文明走向世界的需要。相信通过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合作，融合中、韩两国的研究优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亚洲文明的研究将迈上新台阶。

金在烈先生说，“11年前，我曾访问过浙大，对历史悠久的浙江大学有所了解。经过漫长的时间积淀，相信双方的合作将走得更远，希望双方能在今后共同的合作中为亚洲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

揭牌仪式开始前，金德水与金在烈一行就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向金在烈一行介绍了敦煌壁画数字资源库工程，共同领略了敦煌壁画的数字影像魅力。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1年8月21日，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开幕。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发表主题演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发来贺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中国日报总编辑朱灵、日本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明石康、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等代表发表讲话。来自中日两国政商界、学术界、传媒界等6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中日关系大方向”的主题演讲中对北京—东京论坛的作用和意义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说，论坛创建6年来，历经中日关系冷暖起伏，始终秉承“坦诚对话、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的宗旨，通过建言献策，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渠道和智力支持。对于运筹发展中日关系，他表示，要把握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把握日

本灾后重建振兴，继续向前发展的大趋势；把握绿色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把握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他认为，中日双方要从着力增进政治安全互信、积极打造新的合作亮点、持续深入开展人文交流、慎重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等四个方面做出努力，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持续深入向前发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的贺词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民主党议员莲舫代读。贺词中说，北京—东京论坛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更多人参加，目前已经成为日中双方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本届论坛的题目是“亚洲的未来与经济重塑中的中日合作”，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中日两国应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他表示，明年是日中恢复正常邦交40周年，希望日中两国要

以此为契机，在多个领域继续开展更加活跃的合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讲话中指出，北京—东京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为两国广大民众关心和重视，这与论坛顺应两国民众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希望加强交流沟通、增进彼此了解的期待密不可分。他表示，站在中日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应不断增强两国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不断扩大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之间的民众交流和国民感情。他强调，只要双方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始终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始终坚定世代友好信念，始终以乐观心态看待两国发展前景，就一定能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向前发展。

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讲话中认为，论坛是两国最重要的民间交流平台和两国政府间对话的重要补充。中国在国际社会拥有重要地位，日本愿意与中国在经济等各个领域不断加强合作。

中国日报总编辑朱灵代表论坛的中方主办方发表了致辞。他指出，中日恢复邦交近40年来，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于存在的问题，双方应始终保持接触、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对抗和隔绝。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会改变中日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不会改变两国深化“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大势。他认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北京—东京论坛的真谛所在。

日本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明石康代表论坛的日方主办方发表了致辞。他认为，北京—东京论坛是日中双方能够开诚布公地进行交

流的一次盛会。日中两国应该拿出勇气，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不断加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要通过长期不断地相互交流来建立信赖关系，这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

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于8月22日闭幕。闭幕式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双方代表围绕“亚洲的未来与经济重塑中的中日合作”这一主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为中日两国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理解和互信出谋划策。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日关系已超出双边范畴，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关乎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两国应求同存异，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不断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的交流互动，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持续深入向前发展。

本届论坛下设了政治、经济、媒体、地方和安全五个分论坛，议题分别为“中日的政治互信与亚洲的未来”、“经济重塑中的中日合作”、“中日公众互信与媒体的作用”、“加强地方交流与日本灾后复兴”、“中日合作与东亚安全保障”。

北京—东京论坛是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于2005年共同发起和组织，中国新闻界、学术界与日本民间组织携手，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强中日相互了解而共同搭建的中日精英交流平台。论坛的主旨和目标是“通过官民互动，加强交流，影响和引导两国公众舆论”。经过六年的发展，论坛已经成为中日间为数不多的重要公共外交平台之一，影响日趋扩大。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学生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的部分活动，积极参与并聆听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讨论。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战略文化视角下中国对南亚政策分析¹

史泽华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印两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南亚地缘战略环境的转变以及美国反恐政策重心的调整，作为中国西南部地缘屏障的南亚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愈发重要。本文以战略文化理论为分析起点，对当前中国对南亚外交政策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中国在坚持既定的战略路线的同时，对南亚政策应更重视三个因素，即发挥军事实力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区域外大国格局因素的影响和大力推进公共外交政策。

关键词

战略文化 中国外交 南亚政治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课题研究资助项目结项成果。

导论

很多学者¹对“战略文化”概念的使用较多地借鉴了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定义。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研究是在批评结构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质疑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一个普遍的、非历史的、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概念,认为国家具有历史性,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是不同战略文化社会化的决策者根据不同的战略环境做出的。也就是说,战略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同国家战略行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不同战略文化决定着不同国家对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的认知和态度,塑造了不同的国家身份认知和战略偏好,进而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

江忆恩对战略文化核心范式的验证分为三步:第一步是验证战略文化是否存在。既要考察一国战略文化传统形成时期的重要战略文献,也要考察该国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重要战略文献,如果在这些文献中都存在一种始终一致的大战略偏好等级,那就证明该国的确存在某种战略文化并且一直延续到所选取的历史时期。第二步是验证该国这一具体历史时期的

正如江忆恩所言,战略文化是习得的,因而也是可以变迁的。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堪称跌宕起伏的社会化变迁过程,中国的战略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通过认知、战略偏好和政治程序等多种渠道传递到了外交决策领域。

决策者是否都具有与上述战略文化相符合的战略偏好。如果他们都拥有一致的战略偏好,就说明上述战略文化对这些决策者的行为取向与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已经被这种战略文化社会化。第三步是检验这些决策者的战略偏好是否对其实际战略选择产生了影响。这里主要是分析史实,尤其是考察该国在这一具体历史时期中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实际行为表现。

关于大战略偏好的类型,江忆恩认为主要有3种:一是调和主义战略,

这种战略主要依赖外交、政治贸易、经济刺激、跟随强者、平衡联盟行为以及其他低强制性的政策。二是防御性战略。这一战略比调和主义战略在本质上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它主要依赖外部边界上的静态防御。三是扩张主义战略,这一战略是高度强制性的,主要依赖越过边界的进攻性、预防性、先发制人的或使用优势军事力量实施惩罚性的行为。江忆恩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存在两种战略文化,一种是象征性或理想化的战略文化,即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孔孟儒家文化;另一种是现实中的战略文化,即与主流文化完全相悖的强现实政治文化,具有高度扩张性。

江忆恩的研究的缺陷在于,由于他断言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结果在逻辑推理方面出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甚至推翻了其战略文化理论的基本假定。²不过,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的贡献在于,肯定了历史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学习、反思能力,从而否定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过分依赖理性的研究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和视角,奠定了学科

1 以1997年李际均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战略文化》一文为起点,中国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已有10年的时间,中国期刊网上能搜到的相关论文近百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际均:《论战略文化》,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周丕启:《略论战略文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0期;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方长平:《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到建构主义》,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5期;陈寒溪、罗明运:《防御性战略文化对当代中国国防政策的影响》,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等。

2 李晓燕:《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

基础，开辟了研究空间。

正如江忆恩所言，战略文化是习得的，因而也是可以变迁的。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堪称跌宕起伏的社会化变迁过程，中国的战略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通过认知、战略偏好和政治程序等多种渠道传递到了外交决策领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强现实政治国家向体系内国家身份的转变，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偏好、选择和行为造成了重要的影响。2009年，美国战略研究所学者肯尼思·约翰逊曾撰写了报告《中国的战略文化：美国的视角》，报告从儒家思想、外国干涉和战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世界共同体理念、作为战略文化的思想和原则等角度入手，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特性和外交影响力问题进行了解释，并为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从战略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对南亚政策变化的动因，进而为中国一南亚外交关系的走向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角度。早在1997年，著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便在《大棋局》中为中国的崛起预想了两种结果：一是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并进一步融入亚洲合作框架，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二是中国在不实行民主主义的前提下扩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周边邻国为防止“大中华圈”的出现，必然会与中国发生激烈对立。但事实上，中国崛起路径并

没有按照布热津斯基所预期的两种路径发展，而是出现了更令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一部分周边国家所困惑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战略文化这一重要变量入手分析中国对南亚政策的特征，认识中国的战略偏好和战略行为，观察对象国的战略环境和战略反馈，更有利于降低双方之间发生误读、误解和误判的机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正如多数国内学者的共识，在适度肯定战略文化在国家对外政策实践中的影响力的同时，绝不可以将其看作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主导性因素。由于战略文化自身的特性和战略文化影响国家行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不能期许用一种理论解释所有问题。

一、战略与战略文化

1. 战略的概念及特性

谋定而后动，“谋”即是战略，亦被称为策略，不谋而动就是“暴动”，没有目标、没有方法，任意而为，即使非常有才能的人，其成功机率也非常低，“谋”与“如何谋”也就是战略研究的重点。

德国近代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认为，作为军事术语的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应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斗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一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

署其中的战斗”。克劳塞维茨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可以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但它本身并不是目标。

法国将军和战略思想家薄富尔认为，传统的军事战略是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策所确定之目标的一种艺术。广义上的战略，则是运用力量的艺术，以使力量对于政策目标的达成可以做最有效的贡献。(1) 对于直接威胁，目标只具有轻微的重要性，而所能动用的资源却相当巨大。只要使用这些资源为威胁，即可促使敌人接收己方所提出之条件。(2) 对于间接压迫，目标只具有轻微的重要性，而所能动用的资源却有限(不适当)，不足构成一种决定性的威胁，那么想要达到理想的目标，则必须采取比较阴险的行动，可能是政治性的、外交性或经济性的。(3) 对于一连串连续行动，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所能动用的资源也有限，但目标却有巨大重要性。那么想要达到目标，则必须采取一连串连续行动，包括直接威胁、间接压迫甚至配合有限度的武力使用。(4) 对于长期斗争，行动的自由很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却不足以获致军事性的决定。其目标在磨垮敌人的士气(精神)。(5) 对于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暴力冲突，军事资源很充足，则可以透过军事胜利来寻求决定，以最短的时间击毁敌方的主力。

以“竞争战略”理论著称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战略应该是有目的地选择一

整套不同的运营活动以创造一种独特的价值组合。它应该有独特的价值诉求和连续性，有在不同环节上为实施对象设计的价值链，以及与此相关的彼此促进、且有明确取舍的一系列行动，而不是一种目标、抱负或愿景，不是一些孤立而不相关的行动，或者也不是所有认为重要的东西的简单组合，不宜通过试验的方法来验证。¹ 在商业环境中，战略定位可以使企业进行有别于竞争对手的运营活动，以避免使自身陷入唯“运营效益”是图的零和竞争之中。同时，竞争的优势来自于各项活动形成的整体系统。²

从以上对“战略”的概念的梳理中可以看出：(1) 无论是政治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战略（或企划、规划），其目标都往往具有竞争性，以谋取己方优势为原则。(2) 战略的形成是一连串的、具有逻辑相关性的行动组合，价值判断在战略偏好、选择和行为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战略就变成了“暴动”。(3) 分析决策者进行价值判断时的影响因素很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做出正确判断的准绳。

2. 战略文化的概念及特性

所谓战略文化，就是“国家在运用战略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久的、相对稳定的

从地理环境看，北面寒冷的西伯利亚和极地世界、东面和南面浩瀚的海洋、西南的高山和高原、西北的荒漠客观上抑制了中国先民的扩张欲望，造就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向性和和平性。

价值取向与习惯性的行为模式”。³ 战略文化是影响决策者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深受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影响，属于外延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和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进行重点规范为主要任务）的一部分。正如薄富尔对法国战略文化进行分析中指出：法国沦陷的悲剧不在于军事武装的落后，也不在于兵员质与量上的差距，而是在思想对抗上的失败。当德国用更有活力的思想方法对抗法国时，法国的所有应变能力都显得相对迟钝；在越南的失败并不是战术或是武装不如人，而是根本就没有可以对抗的战略思想，在之后的阿尔及利亚叛变只是再一次证明殖民

主义之不可为，以及反殖民主义的兴起，法国输在没有可对抗的思想；苏伊士运河的干预是军事上的成功，却是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每一次都证明了法国没有自我的哲学思想。

目前，对于战略文化的研究，西方学者更多基于微观层面，将之看作价值观、行为模式或符号系统。中国学者与西方明显不同，更注重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本课题也将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出发，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战略文化中的价值传统和现实取向，及其对南亚外交政策的影响。

二、中国的战略文化特性及在南亚的战略目标

1. 中国的战略文化特性及其影响

H.J. 麦金德有一句名言：“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战略文化理论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具有持久、稳定影响力的战略文化，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之中。探讨中国战略文化的变迁，也离不开对这些要素的把握。

(1) 历史经验——对孤立 / 扩张主义、殖民 / 帝国主义的价值观

1 王小燕、刘源远：《迈克尔·波特重释差异化战略》，载《中外管理》2004年第7期。

2 迈克尔·波特：《什么是战略》，载《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1月号。

3 官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中国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整体性宇宙观念与世界观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中“天下情怀”与“和平追求”的共生性，以及对殖民/帝国主义的排斥性。

从地理环境看，北面寒冷的西伯利亚和极地世界、东面和南面浩瀚的海洋、西南的高山和高原、西北的荒漠客观上抑制了中国先民的扩张欲望，造就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内向性和和平性。同时，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战争只会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于是，自秦汉以来，中国渐渐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无需依赖外部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和平的对外交往虽不少，但未能把中国引向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路径，“不务德而勤远略”也从来不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

但是，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国社会造成了空前的挑战和危机。反侵略战争的相继失败以及救亡图存的沉重压力，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战略文化转变的催化剂，反帝、反殖与对外和平相处成为交相作用的两个价值取向。迄今，帝国主义侵华的遗留问题——边界争端依然是困扰中国对外政策和平发展的重要问题。

(2) 民族特性——对战争/和平问题的价值取向

正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所论，中国战略文化的要旨可以归结为4个字，即道、力、慎、胜，也即修道、备力、慎战、求胜。¹第一是“修道”：“道者，令上与民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第二是“备力”：“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第三是“慎战”但求“全胜”：“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武哲学成为长期主导中国对外战略谋划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而言，一旦边界地区相对稳定，权力持有者更为关注国内秩序，而不是外部环境，关注以德服人，而不是对外征伐。自秦汉以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坚定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道德主义传统，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对外战争中，“义兵”和“义战”等强烈的是非观念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慎战”和“全胜”随之而后。迄今，修道、备力、慎战、求胜仍是主导中国对外军事战略的主要价值取向。

(3) 价值追求——对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问题的价值取向

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成为近代以来被证明和证实的真理性结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抗美援朝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文革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曾谋求对外意识形态输出，但很快就因为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的调整而被放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战略实现了由极左向价值中立、由理想向现实回归的进程。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大部分，中国战略文化实现了常态化。不过，正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极左倾向，使西方和部分周边国家有了把中国描述为“共产主义幽灵”的依据和口实。

(4) 文化心理——对民族融合/孤立、内外关系的价值取向

自古代的数次民族大融合到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表现，无不表现出中国政治社会强大融合和对外学习能力。而多民族、多宗教、地域广、自然差异大等特性也决定了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也成为当今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特性。

总体而言，以上四大传统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重国内政治”、“谋国家统一”、“重军事防御”、“重和平发展”、“善对外学习”的总体特征。

1 李锐：《中国战略文化中的精要之义》，载《环球观察》2005年6月25日。

不过,由于中国反帝、反殖、发展社会主义等特殊经历,这五大特征中隐含的两个矛盾被逐步放大了。一是“谋国家统一”、“重军事防御”与“重和平发展”之间的矛盾,即在领土回归或不流失不能确保的情况下,“重和平发展”往往难以保全,国家对外战略不能为和平而和平。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珍宝岛战役、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等数次新中国卷入的战争,都与领土问题有关。一是“重国内政治”和“善对外学习”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的民族和地理特性,决定了中国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偏好,而这与西方引领的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经济主导、人权观念优先的整体价值取向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外部的压力带来的中国社会内部政治体制和秩序中的持续紧张状态很难轻易消除。新世纪以来,这两组矛盾进一步明显地体现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大国、新兴大国¹、负责任的大国的过程中。

2. 中国在南亚的战略目标

对南亚政策²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也几乎是最能全方位“考验”中国战略文化的政策区域之一。其地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与南亚国家拥有4000多公里共同边境线,也拥有最长的未定陆地边界,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反恐问题、防扩散问题聚集于此。第二,中国与南亚同属发展中国家,都有反帝、反殖民经历,都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都对外部势力的介入非常敏感,都存在内部社会的脆弱性问题。第三,中国与南亚的印度同为新兴大国,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面临如何融入主流国际体系的问题。第四,中国与南亚国家有对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但所选择的道路差异很大,一方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方是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但所处阶段各有不同。

就中国对南亚政策而言,中国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任务在南亚

遭遇挑战和妥协并存的局面,突出表现为中印巴三边就领土和边界问题的争执与合作上;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南亚得到了不同的反馈,主要表现为与“印度模式”的竞争和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中小国家的合作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在南亚也得到了不同的回馈,突出表现为印度的抵制和环印度中小国家的谨慎欢迎上,尤其是在市场拓展、资源和原材料陆上通道建设等方面;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目标在南亚主要表现为海洋通道的控制与管理上,尤其是印度通过“高位政治”维系传统权势结构的努力和中国通过“低位政治”谋求合作性改良上。

在以上四个领域的表现,最终将印证中国战略文化的真实属性;对不同战略目标的优先次序的排列,尤其是对“零和游戏”与“非零和游戏”重要性的权衡,将有可能决定中国在未来中长期内的道路选择。

1 “新兴国家”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共识。“新兴工业化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开始使用,目前国际上使用的最多的是“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这两个词汇,意指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是新兴国家最主要的共同特征。“新兴大国”这个词则蕴含了一定的新兴国家崛起的政治含义。美国学者1999年开始用“新兴大国”来称呼中国,2001年用同一词汇来称呼印度。本文所涉及的“新兴大国”的概念兼具经济快速发展和重塑政治格局的双重含义。

2 国内就中国与南亚关系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赵伯乐所著的《当代南亚国际关系》讲述了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叙述了南亚国家格局的形成概况,并分析南亚各国与美国、苏联以及发达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并将落脚点放在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上。林良光、叶正佳、韩华所著的《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张蕴岭主编的《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两本著作,都涉及中国与南亚几个重要国家的外交发展历程及其对南亚地区的影响。杨翠柏主编的《南亚政治发展与宪政研究》则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以及宪政制度等。在期刊建设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主办《南亚研究》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南亚研究季刊》都比较全面的刊载了南亚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如杨勇的《建国后中国对外关系成就——以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为例》、刘建的《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何道隆的《中国对南亚政策的选择》、薛勇的《中印巴三角关系与中国的南亚政策》等等。但总体而言,对于中印关系的研究成果丰硕,而把南亚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单一性对象的研究不多。笔者认为,从“大周边”而不是双边关系出发观察中国对外战略,更有利于突出宏观研究的优势,与战略研究的整体性要求也更相符。

三、中国对南亚战略的实施情况分析

战略文化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基础性的战略思考图式，虽然最终战略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决策环境的推进或掣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价值取向的选择，推动了整个对外战略的和平转型。在南亚地区，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从“小周边”到“大周边”¹、从单一领土争端为主向多边复合依存为主的转型。不过，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重重。

1. 中国争取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及其挑战

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武力有巨大的作用。只有在国家实力相等的条件下，法律和正义才会扮演角色；否则，强者会随心所欲，弱者将忍气吞声。”冷战期间，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的支撑下，美国与苏联曾依靠各自惊人的核武器数量使双方不敢直接冲突，“冷和平”得以保全。在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印度对华政策中的“冷和平”逻辑再次上演，扭转这一态势的中国外交努力影响力有限。

1961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背负了“失败”的名声。同时，把中国视作主要竞争对手乃至敌手的政策议程也被印度政治精英们固定下来。此

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武力有巨大的作用。只有在国家实力相等的条件下，法律和正义才会扮演角色；否则，强者会随心所欲，弱者将忍气吞声。”冷战期间，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的支撑下，美国与苏联曾依靠各自惊人的核武器数量使双方不敢直接冲突，“冷和平”得以保全。

后，为了收复“失地”重振社会信心、重塑大国地缘政治条件，印度在几十年间悄悄地完成了对周边领土的“蚕食”：先是完成了对中国藏南地区的侵吞、随后又鲸吞了锡金，并通过1965年和1971年两次印巴战争瓦解了来自于东西两翼的威胁。同时，印度努力把自己塑造为“受害者”，诬蔑中国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有领土野心（包括认为中国版图内的阿克赛钦和喀喇昆仑走廊也为克什米尔地区的一部分），并通过中巴合作把触角伸向海湾地区。²

为了牵制中国，印度在达萨拉卡为叛逃者达赖提供了避难地，希望西藏变成印中之间的“缓冲地带”。每当

中国对藏南领土提出要求时，印度总会以达赖喇嘛的地位问题做出回应，甚至以西藏的地位问题进行威胁：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是一个“真正自治的”西藏，而不是一个“威胁印度安全和为向印度提出更多领土要求服务的军事化的”西藏。³随着中国青藏铁路的开通、西藏地区机场的建设、边疆经济开发进程的加快和军队高原协同作战能力的提升，印度社会对中印边界问题愈发敏感和紧张。尤其是在印度军方及一些地方利益集团控制的媒体的炒作之下，中印就领土问题的争执及影响被明显夸大了。在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印度决策精英也开始提升中印边界问题在政府政策议程上的优先次序，危机存在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近年来双方围绕边界问题发生外交风波的几率和频次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印度国防部长A.K.安东尼称：“我们的地理状况以及历史方面迫不得已的情况给我们带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独特的挑战。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来自邻国的威胁。它们继续沉溺于过去并热衷于煽动对我国领土完整的威胁……我们面临的一些最艰巨的挑战就来自于我们的近邻。”

以应对来自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

1 有关此种转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见陈向阳：《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应对挑战》，载《瞭望》2010年8月23日。

2 塞利格·S.哈里森：《中国谨慎控制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纽约时报》网站，2010年8月26日。

3 坎瓦尔·西巴尔：《中国的高压攻势》，载《印度时报》2010年9月9日。

发展“压力”为口实，印度在军事能力建设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发展“烈火”中远程战略核导弹，在边界地区大规模部署新式战机和作战部队、购进核潜艇等先进运载武器等。在外交环境塑造上，印度不仅依靠武器进口使俄罗斯成为其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印度70%的武器需求来自于俄罗斯，印度市场占俄罗斯海外军火销售额的1/3），而且成功在中美竞争中渔利、迫使美国承认其核俱乐部成员地位，还联合德国、巴西、日本等国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印度的目标是通过一些“既是经济选择又是战略选择”的对外合作计划，在战略上形成对中国的威慑、均势乃至优势。有印度学者建议，“印度应该明确宣布，虽然它没有进攻性的军事意愿，也不想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但它的防御能力完全可以威慑中国军队对其领土的侵犯。”¹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一些先进武器的研发和部署，印度越来越有“自信”和有道德优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方面拒绝承认印度对中国藏南地区的非法占领状态，并反对亚洲开发行为该地区提供贷款，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双边增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议程，但所取得的成效不多。2007年开始的中印陆军年度联合反恐训练计划在实施两年后遭到了

可以说，南亚国家在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龃龉或合作，基本以中印边界和领土争端为核心。在争端中，印度占据相对主动地位，呈扩张态势，试图把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内的印方占领地位合法化，从而引发了印中关系的间或紧张状态。而与此问题有关联的周边国家，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博弈方增加，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印度的搁置，两国间艰难启动的“最大的互信行动被抛弃”。2010年，举行了三届的中印防务安全磋商和进行了十四轮的中印边界谈判成果寥寥。中国拒绝向印度北方司令部司令贾斯瓦尔发放签证后，印度叫停了中印防务交流，还威胁向中国西藏公民发放“另纸签证”，两国之间脆弱的互信机制重建困难。同时，印度进行的一系列巩固南亚霸主地位、开启全球大国进程的努力，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也对周边其他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造成威胁，中巴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

逐渐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可以说，南亚国家在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龃龉或合作，基本以中印边界和领土争端为核心。在争端中，印度占据相对主动地位，呈扩张态势，试图把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内的印方占领地位合法化，从而引发了印中关系的间或紧张状态。而与此问题有关联的周边国家，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博弈方增加，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印度据此反向攻击，声称中国和其“代理人”巴基斯坦对其形成了“包围”，“在中国既存在过分的民族自信又有集体焦虑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会促使强硬派和民族主义者更多地显示其实力。”²

2.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的对南亚政策

由于南亚存在“过量”的意识形态，这种状况加剧了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复杂化。南亚存在三种道路选择基本类型，一是以印度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承认三权分立体制、代议制、多党制等西方基本政治体制；二是以阿富汗塔利班为代表的“政教合一”道路；三是以尼泊尔和印度“毛主义”运动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21世纪以来，南亚成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民主化战略的重点区域。在这些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推动下，塔利班成为阿富汗

1 南拉塔·戈斯瓦米：《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要求：精心制订印度的对策》，印度国防问题分析研究所网站，2010年10月25日。

2 乌代·巴斯卡尔：《龙和象冲着彼此咆哮》，路透社2010年8月29日电。

反恐战争中联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和印度的纳萨尔派被列为恐怖主义。尼联共（毛主义）放弃武装斗争路线，进入议会内体制，成为尼泊尔由二元君主制走向共和制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由军政府、总统制走向议会共和制，不丹放弃君主制走向议会民主，斯里兰卡放弃实权总统制走向议会共和制，印度被美国塑造造成“民主标杆”，在这一区域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泛民主化”态势，给中国也带来了一些战略压力。

从意识形态上讲，南亚的“毛主义”运动与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同源性，但当前南亚的这些组织对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认同。在南亚，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没有介入具体的意识形态纷争，而且“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慷慨、不问政治的援助者”，以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例如，中国鼓励尼泊尔各政党之间的对话协商机制，“衷心希望各派从国家的利益和全局出发，通过对话协商，寻求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内部分歧，共同推进来之不易的和平进程。”

近年来，南亚在朝着西方国家期望的方向进行政体转换，但短期内，形式上的西方民主体制、反恐战争（利益、价值、敌友之争）和错综复杂的

地理、历史、种族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时，更多造成的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失序和混乱，而不是民主和发展。例如，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公共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下降、官僚机构腐败高发、司法机构借行政交替和多党制乱局谋求高高在上的地位、军队中的“影子内阁”一直存在……所有这些混乱都无法在短期内消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与外部大国干预同时到来的还有高涨的反帝国、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情绪。尼泊尔的一些政党为了摆脱尼国对印度的长期依赖，不得不向中国寻求“平衡”政策；击毙本·拉登的行动目前已经转变为美巴就主权和反恐问题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一场外交斗争。

在南亚多数中小国家的民主进程陷入混乱的情况下，把印度塑造成全球最大的“民主标杆”成为美国对南亚战略的重要一环。在印度，私营团体（尤其是上层）把美印战略同盟看作印度“经济强国”计划的支柱；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把美国看作其生活方式的“外部保证人”；军队（尤其是上层）把美国看作“先进军事技术和现代化作战系统的可靠提供者”。布什政府以来重视印度的战略受到了印度三大权威社会力量的欢迎。同时，为了进一步培育印度的亲美情绪，在印度共产党和人民党各自受内外问题困扰的情

况下，“美国计划”正在借助辛格为首的国大党把印度左翼力量挤出任何执政联盟。¹然而，美国的扶持未能更具实质性地为印度模式背书。对内，虽然印度在市场开放、跨国合作、国际法治和民主社会培育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它依然存在形象问题：经济收入极不均衡、贫困问题积重难返、官僚体制效率低下、基础设施亟需建设、教育普及未能完成、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印度对本国的信息还没有得到外国受众的认可，外界还不相信印度已经无可逆转地走在了通往现代化和繁荣的道路上。²对外，虽然印度的崛起没有引发明显的恐惧，但印度在南亚地区经济和社会精英以及大众心目中的“软实力”水平依然薄弱。

不过，印度比较成功地利用了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以反华“民主斗士”身份博得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以为自己谋求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服务。印度不仅把所谓的12个“毛主义”反叛组织列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而且诬称中国是这些组织的背后支持者。

3. 新兴大国目标与中国在南亚的“两走廊、一通道”行动

21世纪被很多专家称作“新兴国际世纪”的开端。在摆脱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70%的力量，

1 安德烈·沃洛金：《印度去向何方？》，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0年7月5日。

2 约翰·李：《印度相对中国的优势：软实力》，《商业周刊》网站，2010年6月18日。

成为带动全球复苏的发动机。中国和印度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两者不断有崛起过程的同构性，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有别于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工具来主导市场活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造成了严峻的道德挑战，其海外投资可能合法地危害其他国家安全。¹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生产力的上，而且体现在资本的效能和科研的质量上。从发展角度看，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获取方面的压力日益增长。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极权国家和主权概念不受限制的帝国。在战略方面，中国在保持谨慎的同时也怀有充当世界领袖的意愿。在道德方面，中国希望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能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当前，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力被明显低估了。²据统计，2005—2010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约2200亿美元，全球排名由第18位跃升至第5位，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首位，逐步迈入对外投资大国行列。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当年对外贸易额在全球排名第6位，占全球份额不足4%；2010年，中国进出口在全球排名第二

在促进南亚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所做的是踏踏实实的“民心工程”，希望借此推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共同把握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地区所有成员。

.....
 位，出口第一位，对外贸易占全球份额接近10%。

在南亚，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与援助政策受到了印度之外的多数国家的欢迎。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印度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额基本相当，而10年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印度。经过长时间的“开辟”和“经营”，在南亚逐渐形成了西方媒体所描述的“两个走廊”和一个通道：一个是新疆经由巴控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通向波斯湾的“喀喇昆仑走廊”。据2010年9月印度的统计，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地区确定承担的项目有17项，占中国在巴基斯坦控制地区项目的一半

以上，活跃在巴基斯坦的122家企业中，大部分参与了这些项目的建设。³另一个是云南经由缅甸和孟加拉国、通向孟加拉湾的“伊洛瓦底走廊”。在孟加拉国，吉大港经由缅甸到中国昆明的公路在中国的援助之下已经开始铺设。还有一个是西藏通往尼泊尔的铁路通道。据《印度时报》2011年4月17日的报道，印度铁路委员会官员称，中国青藏铁路西藏境内拉萨至日喀则的延伸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延伸部分全部位于西藏与尼泊尔边界，最终将通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报道称，中国计划从日喀则修建一条400公里的支线至中尼边界的聂拉木县樟木口岸，而后者距加德满都只有120公里。

在促进南亚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所做的是踏踏实实的“民心工程”，希望借此推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共同把握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地区所有成员。一方面，中国以低成本和自己在国内基础设施快速建设中获取的经验来吸引这些中、小国家，以便捷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和丰厚的开发回报来回馈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在实施援助时并不向受援国提出进行改革、增加透明度、组织竞标等条件，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和IMF的做法。而且，不干涉内政原则

1 伊恩·布雷默、德温·T. 斯图尔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引发道德挑战》，《政策创新》在线杂志，2010年8月10日。

2 尼古拉·巴韦雷：《中国，世界第二号强国》，载《世界报》2010年9月1日。

3 普拉纳布·达尔·安德鲁·斯莫尔访谈录：《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美国外交学会网站，2010年7月7日电。

是所有合作的基本条件。正如中国关注“东突”势力与塔利班的联系，期望通过政党交流等多种渠道努力斩断二者之间的联系，却不愿过多地介入或牵扯到巴基斯坦伊斯兰社会内部更广泛的斗争中去。¹

对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强势”姿态，印度从两个方面加以应对。一是强调“孟买共识”的优越性，增强自信心。印度媒体声称，“孟买共识”是介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其基础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也不是“专制资本主义思想”，而是一种民主发展国家的思想，不因为重商主义而注重出口，而是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范围。虽然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慢、经济改革起步的时间晚、穷人的失望情绪严重、吸引的外国投资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政府效率相对低下，但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均衡、抵抗国际经济冲击的能力更强，印度有更理性的公司和银行，比中国的发展更健康，印度有民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成功维护了人们公民自由。² 不过，印度在自由贸易中的傲慢和保护主义的态度，仍令周边的中小国家心怀忌惮。

二是贬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侵犯”印度主权的中国对外经济政

策进行反击。2009年1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美时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增长模式是统治者在中央集权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中实现的，它忽略了对人权、民主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价值观的尊重……即使印度的GDP表现不如中国，我也不会选择中国的道路，我会坚持印度的道路。³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克什米尔成为建设连接中巴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动脉中一个不得不穿越的地区，“喀喇昆仑走廊”的建设因而被印度认为“侵犯”其主权。印度还将此问题与中国反对印方开发中国藏南地区、中美联合声明提及南亚等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在南亚的经济行动有强烈的政治图谋，是“封锁”印度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为了反击这种“封锁”，印度加快了军备研发和军事部署的速度，加紧了对于尼泊尔政治走向的干预（尤其是防止尼联共毛主义掌权），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实施干扰，纠集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或安全利害关系的中小国家共同研讨应对之策等。

4. 负责任的大国与南亚海洋通道的稳定

对于美国而言，印度洋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在布什政府将战略重点由防止地区性大国对其形成挑战转向阿富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

战争的过程中，还是在奥巴马政府结束伊拉克战争、重视阿富汗反恐战争并致力于“重返亚洲”的过程中，该区域都一直是“中轴”线。因此，扶植“令人放心”的区域大国印度、保持印度洋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和航线安全，成为9·11以来美国两任政府的战略共识。对于中国，印度洋也已成为“海上生命线”的重要枢纽，关乎国家能源安全。据统计，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占世界需求总量的10%，而85%的石油进口都要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而且，在中国通过两大陆上“走廊”促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多元化的过程中，印度洋也是无法避开的区域。

可以说，印度洋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印度洋交通航线的安全是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海盗问题等“低位政治”愈演愈烈之时。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采取的战略措施是：在安全领域，与美欧印等国家就海盗、恐怖主义等问题展开合作，确保航线稳定；在经济领域，以与陆上通道建设相似的方式加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虽然中国并未将改变该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国际秩序作为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但中国的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一些中小国家

1 安德鲁·斯莫尔访谈录：《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美国外交学会网站，2010年7月7日电。
2 迈克尔·舒曼：《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载《时代周刊》2010年10月29日。
3 《中国有些过分自信的举动》，载《印度斯坦时报》网站，2009年11月24日。

的战略自主能力。这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这些国家一方面遵照“传统”实施邻国（印度）优先政策，另一方面又担心地区权势结构会因为印度实力的快速膨胀而过度失衡，因而试图在中印之间保持等距离接触。

然而，印度版的“门罗主义”与中国参与印度洋地区开发的政策产生了冲突。在印度和一些西方媒体的炒作之下，所谓的中国在印度洋的“珍珠链”战略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中国和平的互利合作行动被误解和丑化为军事上的战略扩张行为。该说法指称，如果在地图上将中国在印度洋周边国家援建的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缅甸的实兑港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港口连接起来，就宛如形成了印度洋上的一串珍珠项链，是“一连串似乎已在包围印度的‘基地’”。印度媒体称，由于中国把印度作为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崛起看作是美国在亚洲霸权的持续，阻碍了亚太地区在美国霸权结束之后建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中印关系很可能将继续以竞争、紧张、间或进行无休止的谈判以及在相互关心的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为特色。¹ 印度“知华派”、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曾驳斥“珍珠链”遏制理论，称其为“相

中国对外战略在南亚所面临的状况，是中国整体对外战略环境的一个缩影。尽管特殊的战略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非进攻性，但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同步崛起、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历史情结等原因，中国以维系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互利、合作为主题的南亚外交政策在南亚地区收到了不同的反馈。

当无效的谋杀武器”。不过，梅农的理论马上遭到了一批人的反驳。印度外交部长克利希纳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称，印度正在密切监视中国的意图，因为印度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印度洋事务表现出超出正常的兴趣”。²

四、对中国的南亚外交政策的几点建议

中国对外战略在南亚所面临的状况，是中国整体对外战略环境的一个缩影。尽管特殊的战略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非进攻性，但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同步崛起、中印之间的

领土争端和历史情结等原因，中国以维系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互利、合作为主题的南亚外交政策在南亚地区收到了不同的反馈。印度和西方国家所遵从的“冷和平”安全逻辑，使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处于相对守势地位；而中国所推进的与邻为善、共同繁荣的对外经济政策，则使印度在经济安全领域处于相对被动地位。

在这种相对失衡的背景下，为了使“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更为顺畅和有成效，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中国对南亚政策的导向和重点：把所有相关区域国家看作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态系统的“大周边”外交，以降低和转移“小周边”外交中因领土和主权问题而出现的矛盾升级的风险，避开过于重视和依赖大国外交、轻视对中小国家外交政策而带来的弊端，减轻因某些大国对中国真实外交意图产生误解、误读、误判乃至歪曲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对外战略，“大周边”外交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增强决策部门对宏观方向的把握和驾驭能力。正如美国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在谈到美印关系时称，美国对于印度成为一个地区大国怀有兴趣，但奥巴马政府加强地区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受国界调

1 Reshma Patil, “Chinese whispers on India”, *HT Blogs of Hindustan Times*, 5 Sep 2010, <http://blogs.hindustantimes.com/middle-order/2010/09/05/chinese-whispers-on-india/>

2 拉维·韦卢尔：《新的大博弈正在上演》，载《海峡时报》2010年9月3日。

整干扰的国际体系”。在亚洲，“这意味着从东亚安全或南亚安全方面讨论这一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地区已不再有意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其实正在朝类似的方向努力：南亚政策是中国精心打造的长期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在整个南亚地区实施的是多样化的战略接触政策。中国与巴基斯坦等一些南亚国家结成了伙伴关系。从深度和广度上讲，这种伙伴关系超过了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关系大致与中巴关系相似。相比之下，中国与马尔代夫和不丹发展关系时似乎完全在使用软实力。¹

具体而言，与自身战略文化传统相符的中国对南亚的“大周边”外交应该重视以下问题：

首先，发挥军事能力的基础性作用。

以实力为和平背书，曾经是美国在冷战中谋求战略竞争优势的“法宝”。该战略的要点在于，首先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其次是要有使用武力的信心和决心。中国虽然在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并且带头呼吁放弃冷战思维。但是，南亚领土争端

升级的主要始作俑者依然是印度的“冷和平”逻辑。在通过自身的努力难以扭转这一进程的情况下，唯有做好“冷和平”博弈中的另一方，一味地放弃军事斗争准备，没有办法维系和平。中国需要继续建立和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军事力量，继续强大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包括加大海空军等高水平装备的研制、生产、配套与实际应用力度，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实际作战能力，以备不时之需。在防止他国的误读和干扰方面，未来中国的成功将取决于强大的军事能力、关键时刻运用这一能力的决心和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充分信心和耐心。

当然，蛮力买不了领导地位，领导地位不能依靠耀武扬威来获得，而要靠其他国家的赞同或默认来获得。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道“摒弃冷战思维，大力倡导互信互认、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照顾彼此安全关切，最大限度展现善意、智慧、耐心，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积极促进地区安全工作，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²但这一主张的话语权的实现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军事能力。当前，中国的实力在迅速增长，但仍缺乏强制力，不具备用武力击溃对手或者强

迫对手就范的能力。同时，战略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野心。若想取得“激励他人思想”的能力，需要拿出更大的精力修炼“内功”。在亚洲，大国政治时代还远未结束，中国需要对突发性外源危机事件带来的战略利益损害有相对准确的估计，需要像美国一样“把有限的外交精力应该花在亚洲大国之间关乎战争与和平（如何避免前者而维持后者）的‘高端政治’问题上，而不是气候变化和货币争端之类的‘低端政治’问题上。”³

其次，重视外部大国格局的影响。

中国对南亚和平外交政策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印度，而印度与中国展开竞争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大国的赋予，而不是自身能力的质的提升。“人们从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机构中听到的更多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有关印度正在崛起及其具有潜力的言论”。⁴近年来，美国外交活动的“重心”正转向亚太，以防止亚太新兴国家在对美相对实力增长的情况下对现存体系做出挑战，其中遏制中国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扩张成为具体的战略任务。“亲印制华”成为重要选项。⁵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的经济引擎和我们政治上的竞争

1 帕拉玛·辛哈·帕利特：《中国对南亚实施软接触战略》，载《海峡时报》2010年7月3日。

2 《胡锦涛就推动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亚洲提出五点建议》，人民网，2011年4月15日。

3 卜大年：《华盛顿注意了：大国政治时代在亚洲还远未结束》，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10年9月24日。

4 巴拉达·斯戈沙尔：《印度与中国：竞争与合作关系？》，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网站，2010年8月29日。

5 安德烈·沃洛金：《印度去向何方？》，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0年7月5日。

者。同苏联不同，中国并不打算重整世界，但它也不是民主的朋友。中国越来越像苏联那样攻击我们民主政治的缺点……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对我们民主价值观的嘲弄。在同中国的激烈角逐中，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中国将会赢。”¹

为了“规范”中国的和平崛起路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南亚政策的“双重标准”会持续下去，美国把印度塑造成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趋同的利益”伙伴的进程也会维持很长时间，印度会有更多斩获。例如，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巴基斯坦和印度都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两国的核设施也都没有完全处于联合国的监控之下。但是，美国事实上承认了印度的核大国地位，并在积极推进与印度在相关领域的合作，理由很牵强——印度从未有核扩散纪录。与此同时，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则引起了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巴基斯坦曾试图把核技术扩散给一些美国认为的“流氓国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同南亚以外的大国的关系将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印度认为，“与中国和俄罗斯不同，印度是一个老牌

的民主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实现独立和复兴的‘典范’。对于一些超级大国来说，在它们之间目前进行的激烈竞争和角逐中，印度是实现它们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及目标的‘机会’。毫无疑问，印度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在世界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出现了重要的转折点。”²但在较短的时期内，印度显然仍不具备充当落后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平衡者的实力，其民主试验也没有能力成为落后国家通往“自由之路”的“桥梁”。

最后，加大力度推进公共外交政策。

在当前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西方民主理论和规则对国内政治势力规范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中央或联邦权力受利益多元化冲击而相对弱化的情况下，以政府为主要对象的政府间外交的局限性日渐突出，以对象国公众和非政府组织为主要对象的公共外交³的展开，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成为“全天候”的、经得起考验的真朋友。中国对南亚公共外交政策的展开，其战略维度应不局限于以政权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行为体，还应涵盖以不同宗教、种族甚至意识形态为基本单元的社会政治群体

(如专门针对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公共外交规划)；应不局限于国际体系层次的“朋友”，还应包括“对手”。公共外交政策的深入发展，有利于中国增强与“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之间的相互包容能力，也有利于相互了解、理解和谅解对方观点，容纳和容忍对方的利益诉求，不因局部的摩擦影响大局。这与中国对外政策中“尊重多样文明，促进睦邻友好”的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

当前，中国对南亚的公共外交政策尚不够细致和明确，效果也不够明显。2010年5月，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第二届“印度—中国”论坛上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国对印度社会的认知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社会发展方面，多数中国人认为印度富有阶层的富裕程度要超过中国，但他们普遍认为印度人不如中国人勤奋，且大多数印度人生活潦倒，许多人居无定所、浪迹街头。他们同时认为，印度是“金砖四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而不知道印度是继中国之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人对印度仍持有老日的观点，中国家长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印度留学、旅游，因为印度是个“欠发达”国家。⁴

1 哈罗德·迈耶森：《中国已成为美式民主竞争者》，《纽约时报》网络版，2010年4月2日。

2 《国际竞相与印度“友好”》，载【沙特】《生活报》2010年11月21日。

3 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认为，公共外交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

4 《调查显示中印对彼此看法迥异》，《印度斯坦时报》网站，2010年5月15日。

澳大利亚华文媒体与 主流媒体传播中国文化的对比分析¹

刘琛 /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摘要

2011年,中国在澳大利亚举办“中国文化年”。以此为背景,本研究对比分析了中国文化在澳华文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传播特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华文媒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文化自觉性,但是传播质量和实力有待提高;澳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的解释相对刻板,而且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传播也较为滞后。中国文化在澳大利亚的传播状况表明,在今后的中澳关系建设中,需要探索并提出新的传播策略才能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讲好中国的故事,加深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文化 澳大利亚 华文媒体 主流媒体

2010年6月9日,以“想象澳大利亚”为主题的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正式开幕。澳驻华大使芮捷锐在致辞中指出“这次交流是澳中文化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自启动半年来,澳大利亚已经在中国举办多项活动,较为成功地向中国人民展示了澳大利亚的文化风貌。

根据协议,2011至2012年,将由中国在澳大利亚举办“中国文化年”。那么,中国文化在澳传播的现状如何,该如何把握这个机会更好将一个鲜活的中国文化形象展示给澳洲人民呢?为此,本论文进行了以下对比分析:

一、澳华文媒体传播中国文化形象评价

1894年第一份中文报纸《广益华报》(the Chinese Australia Herald)问世,自此华文在澳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上,华文报纸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1902年创办的《爱国报》(Chinese Time),就曾倾力协助孙中山先生。1982年,香港《星岛日报》发行澳洲版,当地有了第一份华文日报。此后,澳华文媒体迅速覆盖全澳洲。按澳官方统计,华文传媒与意大利、希腊等各

民族社区(ethnic community)的相关媒体相比是最为发达的。以悉尼为例,“华文日报比英文日报还多,以人口百分比统计,全球各地将无出其右者”。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澳洲的华文报纸主要是以《星岛日报》为代表的港台报纸的天下。这些报纸都有实力雄厚的财团支持。由大陆赴澳华人经营的报纸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且因入门槛过低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此类华文报纸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根据笔者在澳主持的《墨尔本华文媒体发展状况评价》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课题研究资助项目结项成果,发表于《对外传播》2011年第3期。

(2009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陆华人报纸经过近十年的优胜劣汰,已基本进入良性竞争阶段。其报道质量和实力,以及与祖国媒体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以《华夏周报》等收费周报为例,这些报纸基本是40版,以时事新闻为主,不仅关注澳洲华人生活也及时报道澳洲、中国和世界新闻。从新闻内容来看,它们能够及时反映澳大利亚和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此外,它们都非常重视联系华人团体,积极维护华人权益。其中一个案例是2008年1月22日在维多利亚大学任研究员的曹中军博士遭遇歹徒袭击身亡,华文媒体纷纷展开深度调查,追踪评价审判结果,并号召华人开展募捐和慰问等活动。这些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提升了华人的凝聚力。

总体上,由大陆华人经营的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是以自身行为生动诠释中国文化价值观。例如:儒家文化非常注重“仁爱”精神,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澳华文媒体一直积极参与各种慈善事业,不仅心怀祖国也关注澳洲。在祖国遭遇自然灾害和2009年的维省大火等事件中,华文媒体倾尽全力进行了大量报道并积极策划和组织慈善募捐等活动,赢得了赞扬。其次,这些媒体对宣传中国文化满怀热情。华文报纸都设有相关固定专版(有的多达10页)且图文并茂,其选题涉及中国历史、习俗、文化典籍和文化大

家等多个层面。这些文章成为澳大利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第三,它们关注当下中国的文化形象。这些华文媒体开辟专版及时地介绍中国,甚至是各省的各项文化活动和宣传政策,例如:《华夏周报》的《魅力安徽》。此外,它们还通过组织“征文活动”等生动地展现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例如:在2008年“第二届全球华文媒体国际峰会”期间,《华夏周报》开辟“志愿者”专版,让读者领略到了中国的“80后”和“90后”们积极向上的风采。

综上所述,澳大陆华人创办的华文媒体大多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致力于架起中澳文化沟通的桥梁。然而,它们在前进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欠缺厚重的文化积淀,影响了文化传播的质量:华文媒体的有关文章基本源自网络,而且关注点偏重于“猎奇”、“市井”、“美食”和“养生”。从这些文章里看到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宫廷”、“传奇”以及“中医中药”,因此无法生动、全面地展示和说明中国文化精神。此外,由于财力有限,限制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和渠道。就传播效果而言,当地影响力大和最受喜爱的华文媒体主要还是港台的。从传播渠道来看,大陆华人经营的媒体以报纸为主,广播,尤其是电视尚处于起步状态。广播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华人的日常生活,例如:提供各种商品、就业、交友信息,

播放点播歌曲,交流居家过日子的小窍门和拿手菜,提供倾诉热线等。对此,受访华人的评价是“(整体看来),电台扮演着全心全意为墨尔本华人过日子服务的角色,像是居委会”。电视台因为经营成本较高,受到的限制更多。华夏传媒集团于2005年创办了华文电视台,其节目来源主要来自国内电视台,例如:广东台的《今日广东》等。但是,由于资金有限,该电视台的自办栏目特色不足,难以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总体上,澳华语广播和电视还难以胜任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二、澳主流媒体传播中国文化形象评价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特征。据统计,澳全国共有200多种语言。

中澳经贸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经贸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此外,在澳的华人总数不断增加,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澳大利亚华人约67万人。2007年,Kevin Rudd的工党政府自上台之初,即宣布要建立着眼于未来的中澳50年战略设想。

然而,与中澳关系发展不相匹配的则是澳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形象传播的滞后和“刻板印象”模式。

以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公共电视台ABC和SBS为例,前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电视台,后者是澳联邦政

表 1: ABC / SBS 对 2010 年中国重大事件相关报道数量统计

事件名称	ABC 报道数量	SBS 报道数量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	0
IEA 宣布中国为能源消费第一大国	1	1
上海世博会	4	27
玉树地震 / 舟曲泥石流	14	0
十七届五中全会	3	0

表 2: ABC 和 SBS 涉华报道总体倾向性分析

事件名称	正面 / 肯定	负面 / 否定	倾向不明显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0
IEA 宣布中国为能源消费第一大国		1/1	
上海世博会	1/3	2/6	1/18
灾害事件	6/0	4/0	4/0
十七届五中全会		1/0	2/0

(注:表中左侧数字为 ABC 相关统计,右侧为 SBS 相关统计)

府资助的民族电视台。笔者以 2010 年反映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形象的相关重大事件为案例分析了两家电视台的涉华报道,发现:

首先,ABC 和 SBS 对华报道的数量比较有限。(见表 1)

其次,ABC 和 SBS 对华报道的立场以负面为主,SBS 更加如此。(见表 2)

在报道中,两家电视台对中国进行报道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即在报道具体信息时,立场是客观的;在进行观点评价时,态度多为负面的;更多的时候新闻的主题是正面的,但是镜头里的画面却时而出现“另外的景象”。以“玉树 / 舟曲灾害性事件”报道为例,ABC 在报道中,其“正面”类报道指的是报道受灾情况和救

灾进展等信息(6 条),但是在评价“中国政府”的角色及作用时,就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批评(4 条)。此外,当报道“受灾居民”的情况时(4 条),整体上中国人的形象仍然是无助的、软弱(weak)和茫然的,一如当年澳洲的华工。再以 SBS 对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为例:SBS 对中国人的“组织文化”和行为方式表示不认可(6 条)。此外,在报道“世博”具体活动时(18 条),如某国馆日,虽然标题和解说文字是客观性陈述,但是镜头里展示的却是拥堵、情绪冲动的参观者和组织者的无奈与抱怨。

同样地,这种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的隔膜和误读也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态度上。根据笔者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古代经典文化在澳大利

亚的传播》研究结果显示,澳大利亚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绝大多数的有关研究成果是从中国直接引进的中文著述,少部分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学者的作品。可以说,从中国文化在澳传播的发展状况看,澳主流媒体并不关注中国文化,其报道和研究数量与质量都有待提高。因此,澳本土受众仅凭借国内的主流媒体是难以理解和体会中国人及蕴育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中国的。这个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在澳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

总之,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澳两国交流的日益深化并没有带来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自然提升。在华文媒体中,港台媒体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形象关注有限,无法与大陆华人华文媒体相比。但是,后者的影响力却相对较弱。此外,澳主流媒体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研究热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澳得到高度重视的基本是“致公堂”、“四邑会馆”、“官庙”和“华人古坟场”等展示“刻板印象”式的中国文化符号的遗迹。上述问题表明,对于如何将中国文化生动地、真实地和丰富多彩地介绍给澳大利亚,如何更好地帮助华文媒体发挥作用,如何激发澳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中国外宣和侨办等有关部门还需要提出更加有效的传播策略,从而让 2011 年成为将中国介绍给澳大利亚的再出发。



越南的中国研究¹

钟珊 /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国外的“汉学”或“中国学”²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统称。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于中国各领域问题的研究。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因素，中国和越南

可以说是“同种”、“同文”³的一对邻邦。中国研究对于越南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研究中国不仅是为了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想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些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越南传统文化。本论文通过介绍越南

学术界对于“中国学”起源问题的争论、越南中国研究的历史进程及现状，对越南的中国研究特点、成果以及有待改进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信息汇总资助项目结项成果。

2 “汉学”（英语：Sinology；法语：Sinologie）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进行研究，到了现代，除上述研究对象外，研究领域有所扩展，开始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中国学”（英语：Chinese Studies 或 China Studies；法语：L'etude sur la Chine）与汉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侧重于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汉学在中国学出现之前已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中国学则被置于区域研究之中。这两个概念更详尽的解释可参见何培忠主编的《当代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一章中的内容。

3 熟悉越南历史的人都知道：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象郡则包括了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自此，历史上曾发生了多次向岭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汉族和当地的百越民族“杂处”，相互融合，这就是所说的“同种”。据考古资料显示，汉字早在西汉时期就已传入越南，并在此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始终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所说的“同文”。

一、越南研究中国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越南、日本、韩国和朝鲜同属“汉文化圈”，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汉学在越南有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中国学家阮辉贵 (Nguyễn Huy Quý) 教授曾用“独一无二”四个字概括出了中国研究在越南的独特地位。他指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越南和中国‘同文’、‘同种’，现在又是好‘同志’的关系。因此，中国研究对于越南学者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了解世界文明古国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了解越南，说得更加具体些就是为了了解那些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越南问题。”例如：只有了解了汉字才能够真正了解喃字；只有了解了青心才人所著的章回小说《断肠新声》，才能真正读懂阮攸所著的六八体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只有了解了自秦汉到明清的中国历史，才能真正了解越南千年“北属时期”的历史以及从丁朝到阮朝“独立自主”时期的历史；只有在了解了中国各封建王朝的政治、科举制度后，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越南相应的问题。¹ 尽管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两国之间经历了许多风

风雨雨，越南的中国研究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但正是这段时间缺少对中国的研究使得后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南党政机构及学术界更加注重对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而且越南同中国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越南称为“革新开放”政策，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越南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近些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总体来讲，越南对中国的研究包括两部分：一是对传统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历史、文学、哲学、文化等领域；二是对现当代问题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不论是对中国传统问题的研究还是现当代问题的研究，对于越南的中国研究来说都至关重要。² 笔者认为，目前越南国内更注重对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

二、学术界关于越南“中国学”的起源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欧洲人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但学术界认为：中华文明走进西方各国大学课堂，成

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对象，应是从 1814 年 12 月 11 日，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 (Abel Rémusat) 创建“汉语和鞑鞑语——满语语言与文学” (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 讲座开始的。换言之，西方的汉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学科至今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

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越南人很久以前就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但自何时开始越南对中国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一门学科——越南的中国学？直到现在越南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在越南，人们对于中国学或汉学的研究自从先祖们与中国一开始打交道就出现了”。³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越南的中国学开始于胡志明时代。“胡志明开创了用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汉学的方法”，“在 1945 年八月革命前，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仍旧推崇汉学，并且用此种新观点创作出了许多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史学方面的著作”，“可以说，虽然汉学在我国（越南）从很久以前就有所发展，但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才成为一门学科”。⁴ 目前，多数越南学者赞同第一种观点。⁵

1 阮辉贵：《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越南的东方学——第一届国家科学研讨会纪要》，2000.11.29—2000.11.30，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第 291—292 页。

2 阮辉贵：《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越南的东方学——第一届国家科学研讨会纪要》，2000.11.29—2000.11.30，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第 292 页。

3 越南学者阮文阁先生持此种观点。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90 页。

4 阮辉贵：《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越南的东方学——第一届国家科学研讨会纪要》，2000.11.29—2000.11.30，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第 293 页。

5 根据 2004 年 10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越南问题学者潘金娥与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阮辉贵教授座谈记录。

三、越南的中国研究发展的几个阶段及主要特点

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笔者把越南的中国研究的发展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越南古代——“北属时期”及“独立自主时期”的中国研究

越南有两千多年可考的信史，其中约一千多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约一千余年它是独立的封建国家，作为中国的“藩属”而存在。史学界把自秦代至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前这一段时期称为越南的“北属时期”。¹把公元968年至1884年这一段时期称为越南的“独立自主时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内，越南无论是在民族渊源、文化濡染，还是在政治沿革、经济模式方面，受中国的影响都极为深刻，并形成了越南的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的主体。可以说，北属时期和独立自主时期的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是“难分难离”的，这也就是学术界关于越南中国学起源问题的纷争所在。正是从古代中越两国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中，从当时中国对越南的深刻影响中，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越南对中国的研究。

自秦征服岭南²后，从中原迁徙

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很早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越南因长期受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独立后仍继续依照中国的行政模式治理国家，因此中国的行政体系、典章制度对越南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五十万人南戍五岭，其中为数众多的汉族南迁象郡³。“这数十万中原移民，与越人互通婚姻，友好相处，用勤劳的双手，艰苦的劳动，共同开发了祖国美丽的南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与接触交往中，血缘融合，文化互补，习俗相染，潜移默化，浸润影响，使岭南越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原人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推动了越族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批南下的中原人，是汉文化的传播者，是浩浩荡荡的汉文化宣传大军。”⁴自秦朝后，历代百越民族后裔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 政治方面⁵

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很早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越南因长期受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独立后仍继续依照中国的行政模式治理国家，因此中国的行政体系、典章制度对越南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国土的行政区划

在丁部领统一全国后，曾把疆域分为十道。现在虽已不能详知各道的名称和方位，但越南古代史籍记载中仍采用唐代为安南各州所定的名称，如爱州、峰州等，可见这些名称在当时仍被沿用。唐太宗元年（公元627年）曾分天下为十道，岭南为第十道。而丁部领独立伊始，就把其国土分为十道，显然含有仿效中国唐初的行政建制之意。他把唐朝原设在安南的十州升格为十道，则进一步显示其与中国封建王朝分庭抗礼的决心。到前黎朝大行应平九年（公元1002年），又“改十道为府、路、州”，其下还设县。此后，尽管越南历代封建王朝多次对全国行政单位的划分进行过调整，但基本沿袭府、路、镇、州、县等名称，而且历朝所用行政单位的名称和结构与当时中国朝代相应。

1 中国史学界也把这一段被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和藩属的时期称为“郡县时代”。

2 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历史上，岭南也包括曾属中国皇朝统治的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3 象郡包括今广西一部分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

4 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5 主要参考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29—37页。

2) 行政机构和官职的设置

越南独立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行政机构。但历朝行政体系不是照搬中国的行政机构体制，就是从其中脱胎而出的。从越南历代所置的宰相、亚相、尚书、御史、侍郎、学士、翰林、谏议大夫等官职名称，文武官员各有九品的体系，以及各种不同等级官员品服等都可看出其受中国影响的深刻痕迹。对于越南采用中国官制的做法，《宪章类志》的作者潘辉注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曾就此评价道：“改遵宋制，似有可取。”

3) 法律的制定

唐朝的重要法律《唐律疏义》，不仅是中国后来宋、元、明、清各朝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而且对越南成为独立国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黎朝圣宗时，越南于公元1483年制定和颁布了被后人称为《洪德法典》的法律，其内容涉及刑法、民法、诉讼法、婚姻和家庭法等，形成越南封建时代的第一部完整的法典。值得指出的是，这部法律正是在中国法典，特别是《唐律疏义》的基础上制定的。

4) 推崇儒学、实行科举制度

以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理论为基础创立的儒家学说，为越南历代王朝所推崇，对其行政、

典章制度的制定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早在郡县时期，孔子的学说就已经传播到交趾地区。秦末汉初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他对汉文化南传的贡献尤为突出，是儒学传入岭南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东汉三国之际是儒学南传的重要时期，儒学比以往在岭南传播更加普遍，而且对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更加广泛，连最边远的地区也如此。”¹在此过程中，必须提到的有东汉时期的交趾太守锡光和九真太守任延以及三国时人士爨(xiè)，他们都对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王朝继续以儒家学说作为其安邦治国的支柱。李朝时，于公元1070年首建文庙，奉祀孔子。公元1075年，举行了越南独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翌年建立国子监，作为太子和文职官员学习儒家经典的场所。陈朝建立后，太宗感到国内礼仪不成规范，有必要按照儒家理论来加以改造。他遂于公元1253年，创办国学院，塑孔子、周公、亚圣像，并画72贤像，定期祭祀。他还诏谕天下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儒家经典。陈朝时，科举制度更趋于完善。从越南科举考试的组织、考生的选拔方式、三

魁的名称等都可看出，越南的科举制度完全沿袭了中国的做法。公元1428年后黎朝建立，为了选拔人才，黎利于公元1434年举行科举考试，并规定以后每三年进行一次大选。黎圣宗黎灏更是推崇儒学，视其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朝廷重臣几乎全部都经过科举考试选拔。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了推广儒学的影响，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兴建文庙、规定其建制、规格和管理体制。

2. 经济方面

1) 货币制度²

越南古代钱币，无论在形状、重量、图案等各方面都竭力模仿中国的铜钱，连其铸造技术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在越南历代封建王朝模仿中国货币所铸的钱币中，以黎圣宗黎灏模仿唐“开元通宝”所铸的“洪德通宝”、“光顺通宝”最为合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初年就已出现，被称为“交子”。越南很快仿效中国，也发行了纸币。由此可见，中国货币制度对越南影响之大、之快。

2) 效仿中国各种工艺技术和科学技术³

中国的城市建筑技术传入越南的历史最为久远。早在郡县时期，就有许多关于历代郡守在交趾筑城的记载。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惜大

1 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2 主要参考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47—49页。

3 主要参考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51—95页。

兴土木，营建都城官室。他们在建设过程中，仍然注意吸收中国的建筑技术，参照中国城市布局。在越南古都河内，曾仿照中国城市布局，按专业划分手工作坊区和商业区。阮朝都城顺化和王宫，则更是模仿中国北京及故宫的模式营建，许多城门、殿名也和中国故宫完全一致。时至今日，人们在越南各地还可看到大量与中国建筑基本相同的寺庙、民居等。

越南郡县时期，一直采用中国历法。即使在独立以后，越南封建朝廷仍然接受中国历朝宫廷颁赐的历法。从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赐安南国日历起，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1812年越南正式颁布的《协纪历》标志着越南历法的正式确定。其内容参照了清康熙年间重修编订的《历象考成》一书，仍广泛采用了中国历法家所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干支纪年、纪日等，其格式也与清朝的《时宪历》大致相同，可见越南历法始终受到中国历法的深刻影响。

此外，中国的陶瓷、造船、采矿、蚕桑丝织工艺，以及造纸、印刷术、火药、中医药等科学技术也对当时的越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

越南人对当时中国经济各领域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3. 文化方面

1) 汉字的传播与影响¹

由于历史原因，汉字早在先秦时代就已传入岭南，但岭南越人广泛使用汉字，则从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开始。当代越南学者阮才书、章收认为：“中国人来到这里以前，越南人还没有文字。汉人来到后就把手字传到越南来，从这时起，越南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文字，越南人叫汉字（从汉代传来）。中国文字除了记录中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文件之外，还成为传播中国学术的工具。同时，越南语言也一步一步地接受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使越语越来越远离初期的情况。”由于汉字与儒学几乎同步传入岭南，所以在越南语中称汉字为“儒字”（chữ Nho）。经过西汉二百年间众多南下中原人的努力传播，已经使越族中一部分人“稍知言语”了。再经东汉锡光、任延以及其他汉族士人兴办学校，传播儒经，越族中更多的人能够讲汉语，识汉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是，越南自从汉代起使用汉字，13世纪出现喃字²以后，一般人著书行文及政府文件告示仍沿

用汉字。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汉语汉字一直得到政府的提倡。李朝（公元1010—1225年）时，把汉字定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在1010年下诏迁都升龙（今河内），就是用典雅流畅的古汉文撰写的。这篇《迁都升龙诏》，是保留至今的越南历史文献中最早的成文典章。陈朝时，虽然仿照汉字创造了喃字，但直到法属（1885年）以前，越南流行的仍是汉字。阮朝时，明命帝于1839年奏请中国清朝道光帝颁发《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学习汉文。1867年，越南的嗣德皇帝曾说过：“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盖自上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³16—17世纪间，西方传教士来到越南，学会了越南语，并用拉丁字母纪录越语读音，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越南文字——国语字。1935年，法国殖民主义者统辖下的越南政府批准各学校用拼音文字进行教学。1936年明令废除汉字的通用。但“新文字的通行，在形式上好像扫去了汉文化的痕迹，但实际上汉文化对越南的陶冶儒沫深而且久，决非改变一下形式即可除去的。”⁴直到现在，越南现代国语

1 主要参考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124、125页。

2 或称“字喃”，是一种仿效汉字，采用汉字的结构和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而形成的越语化的方块象形文字，每个字都包括一个或以上的汉字。这些汉字部分用以表音，部分用以表意。

3 杜敦信、赵和曼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4 颜保：《浅说汉文化在越南》，《东方文化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29—334页。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字中仍有 70%—80% 的汉越词，其中包括一些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的古汉语词汇。

上文提到，大约在 13 世纪初叶，越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字——字喃。李朝时，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用字喃撰写碑铭，到公元 14 世纪，字喃开始系统化，并被用于文学创作，也被用以介绍和推广中国古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字喃多用于人名、地名、告示及通俗的文对。至于著书立说、开科取士等仍采用纯粹的汉文。由于字喃书写繁复，笔画比汉字还多，连深谙汉字的知识分子也觉得学起来困难，因此字喃逐渐丧失生命力，最终在拉丁化文字的冲击下成为一种死文字。¹

2) 文学的影响

由于越南长期使用汉字，因此它的文学也长期以汉文文学为主流。在越南，许多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都是根据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或在其影响下写成的。例如：在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的影响下，越南在公元 13、14 世纪时出现了传奇故事类的传记性文集。其中最早的残本有公元 1329 年李济川编著的《粤殿幽灵集》，以及公元 1493 年陈世法撰写，武琼、乔富修订的《岭南摭怪》等，它们记述越南

越南许多风俗习惯同中国一样，从服饰到家庭关系，从传统节日再到婚丧嫁娶，无一不体现出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的越南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研究。

古代君主、大臣、寺庙、神迹、风俗、习惯等，其中有的故事来源于中国的《搜神记》、《才鬼记》、《交趾记》、《南海古迹记》等著作。16 世纪时越南作家阮屿的《传奇漫录》是模仿中国翟佑（1347—1433 年）的《剪灯新话》创作而成的，是越南第一部汉语传奇文学作品，被古人誉为“千古奇书”。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标志着越南文学进入其历史上真正的传奇故事时期。后来，越南著名女作家段氏点（1705—1748 年）还为此书写了名为《传奇新谱》的续篇。值得指出的是，越南的字喃文学作品也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如阮攸的六八体长诗《金云翘传》（又名《断肠新声》）是越南喃字文学发展到顶峰的代表作，是越南古典文学经

典名著，是越南文学的瑰宝，是以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说《金云翘传》为蓝本写成的。此外，阮嘉韶的《宫怨吟曲》系模仿中国韩邦靖的《长安官女行》而写，阮辉似（1743—1790 年）的《花笺传》也是根据中国明末第八才子著《花笺记》用字喃编译的。

3) 宗教、艺术、风俗习惯

佛教是越南的主要宗教，分别从印度和中国传入，其中以从中国传入的北传佛教为主。从中国传入越南的佛教，以禅宗影响最大，至今为止，越南大多数僧尼和居士都属于中国的禅宗系统。越南的大乘佛教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经，诵读汉文佛经，受戒礼也和中国相同。²

越南道教起源于中国，是通过当时越南知识分子即儒士阶层进入越南的。自丁先皇时期（10 世纪末）起，道教在越南就已盛行；李朝时，道教与佛教、儒教共同发展。道教虽未像其它宗教那样盛行，但至今在越南仍有相当的影响。许多佛教寺庙里常供奉玉皇大帝、齐天大圣等神像。在越南本土宗教——高台教的供桌上也将道教视为儒、释、道三大宗教之三行职教中的一行。

中国的各种传统艺术对越南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

1 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年，第 101—102 页。

2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493 页。杜敦信、赵和曼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 年，第 256—257 页。

3 张加祥、俞培玲：《越南》，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第 110 页。

越南历代王朝的御用礼乐多以中国的宫廷音乐为蓝本。越南最古老的口从剧类似中国的京剧，其内容不少是取材于中国的。“据说古典口从剧(tuồng)中，有80%取材于中国。《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说唐》、《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中的故事，在越南的戏剧艺术中都得到广泛的反映。”³

越南许多风俗习惯同中国一样，从服饰到家庭关系，从传统节日再到婚丧嫁娶，无一不体现出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深，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的越南在这些方面对中国的研究。

(二) 越南近现代——“法属时期”的中国研究

越南把从1885年被法国占领到1954年独立之前的时期称为“法属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受到了限制。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成了许多越南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但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在越南南部兴起了一个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热潮。不久后，在越南北部，一些文人掀起了更大的翻译热潮。他们不仅翻译中国作品和越南的汉语古籍，还翻译西方、主要是法国的文学作品。其中，阮有进、阮杜牡和潘继秉等人用拉丁化国语译介了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

神榜》、《再生缘》和《岳飞传》等。现在，中国的古典名著在越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这与他们的劳动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进入白话文时期。由于越南在此之前只研究古代汉语，因此在中国的白话文刚刚开始出现时，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了解。只有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统儒学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一新文化的影响。因此，越南学者把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称为“空白”年代。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才又重新得到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鲁迅、郭沫若、曹禺、老舍等作家及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文学，对胡适、陈独秀的革命文学也作了一些介绍。例如：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等主要作品都被译成越南文。²

当时越南的主要中国学家大都是革命者，他们几乎都是儒学世家出身，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虽已接触西学，但仍十分钟情于汉学。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潘佩珠、胡志明(阮爱国)、邓泰梅、陶维英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对中国的研究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有以潘佩珠为代表的越南老一辈改革家，不仅研究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思

想，而且研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准备在越南付诸实施。后来胡志明到广州，深入地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吸收越南进步青年到中国学习，回国开展革命运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从延安辗转转到越南边界，建立了解放区，直到发动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援越抗法期间，通过中国顾问的介绍，越南全面地接触和研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胡志明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依据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马、恩、列、斯主义”，并亲自把《实践论》翻译成越南文在党报上全文发表，供越南干部学习、研究。邓泰梅是当时对中国文学进行介绍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学术界认为，是他从文学入手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的研究。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作品有：《鲁迅》(时代出版社，1944年)、《当前中国文学中的杂文》(新时代出版社，1945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事出版社，1958年)、《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和密切关系》(《文学研究》1961年第7期)、《与中国文学接触过程中的几点回忆》(寄中国诗文特刊，河内文学出版社，1959年)。对于上述这些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潜心研究汉学也就等同于保护东方文化、对国家和人民

1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2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94页。

尽忠孝之心、不受帝国殖民主义腐化。

总之，1945年八月革命前，越南社会正处于交替时期。以法国为主的西方文明以殖民的形式传入越南，挑战了汉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少数革命知识分子依旧暗中坚持宣传中国文化，紧随中国社会的发展，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新观点。他们主要通过文学形式传播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信息，因而形成了西学和汉学并重的格局。”¹

（三）越南当代的中国研究

自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的中国研究主要经历的以下三个阶段：²

1. 发展时期（1945年8月独立——20世纪70年代中期）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尤其是越南北方解放后，在以首都河内为代表的北部地区，中国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越南数千人在中国接受了培训。他们从中国留学回国后，有的分配到大学里教书，有的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从而为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补充了力量。在大学和研究院里，有关中国的课程和研究课题非常受重视，大量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在越南得以翻译和出版。但在这个时期，越南对于中国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学习中国的革

命经验。

2. 中断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末）

这一时期是中越关系破裂，导致军事冲突的时期。当时的政治背景使越南的中国研究受到严重影响。带有学术性质的授课和研究工作停滞不前。对中国的研究由原来的全面展开变成以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为主。外交部、国防部和安全部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但目的主要是对中国进行批评和对抗。这期间，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讲授和教程编写工作几乎完全停滞，学生的毕业论文几乎没有选择与中国相关的题目。中国的书报也不得在越南公开发行。

与此同时，越南一些高层有识之士在困难的条件下认真注视并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为以后的革新开放大转弯做了思想准备。

3. 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至今

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中国研究在越南的“复兴”阶段。只几年的时间，各所大学、研究院和相关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课程和研究快速地恢复并发展起来。1993年，隶属于越南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中心³成立。该院的《中国研究》杂志也于1995年6月首次发行。越南的许多大学恢复了汉语专

业，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的东方学系还开设了中国学专业。许多大学生选择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题目，题材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众多越南大学生、研究生被选派到中国留学。据2010年越南驻华使馆公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目前越南在中国的留学生和实习生共计有30000人，数量已是各国留学生中最多的。中越两国学者还开展了许多学术交流。这些活动，为越南的中国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提供了充实而可靠的基础。

这一时期，越南对中国的研究，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和中国的实践。越南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七、八年开始实行“革新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从理论界到各有关部门都注意研究。《邓小平选集》的翻译和出版，《邓小平谋略》（越南文）的编撰，以及多次派出代表团到我国高校党校等单位进行访问和研讨，都是关注中国研究的事例。

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包括笔者在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越南语教研室的教师们承接了越共中组部165项目高翻班的培训工作。该项目是越南中组部选派越南党政领导干部来华学习、进修项目，系中越

1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95页。

2 阮辉贵：《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越南的东方学——第一届国家科学研讨会纪要》，2000.11.29—2000.11.30，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第293—294页。

3 现更名为“中国研究院”。

两国之间在党政人才培养领域的重大合作，经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此次培训任务得以圆满完成，越南学员们在回国后，都成为了越南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专家。

四、越南的中国学研究现状

(一) 越南中国学研究机构

新时期，中越两党两国在“十六字方针”¹和“四好精神”²的指引下，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军事等各领域展开了空前的交流与合作。为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越南的中国研究全面得到恢复和发展。除已有的党政政策研究部门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研究院和研究中心，以服务于中国研究和分析工作。各大高校也新增或扩招汉语专业和中国学研究专业。越南的中国研究机构分为以下两大系统：

1. 党政的政策研究机构系统

主要包括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越南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 (Ủy ban Đối ngoại Quốc hội)、各大部委 (如：外交部、内务部、工商部、国防部、公安部等)、党政各部委下属院校和研究部门 (如：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研究院、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学院、亚洲司、多边合作

司等) 以及越南外交部驻中国使领馆。

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Ban Đối ngoại Trung ương) 是直接为越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书记处提供对外主张、政策的参谋机构，是越南共产党负责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其内部设有“中国——东北亚司”。

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研究院是越共的首要研究部门。该院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在越共的中国问题分析中起过重要作用。从河内社科信息研究院 (Viện Thông tin Khoa học xã hội) 图书馆的不完全记录看，该院曾在 80 年代中后期出版过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内部参考资料。目前，该院正在加强和拓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和分析。³

总而言之，以上党政的政策研究机构从事中国研究的目的是为越南党、政府和各部门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以情况调研、收集分析情报为主。

2. 学术研究和教学单位系统

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单位系统主要由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下属各院和各高校、中文培训中心组成。

1) 越南国家社会科学院下属各院

中国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1993 年 9 月 13 日, 直属于“越

南社科研究中心”⁴ 的“中国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后该中心更名为“中国研究院”。⁵ 这是越南官方研究机构，也是当时越南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其宗旨是：开展中国问题的基础研究；开展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而进行的对策研究；培养中国学人才，推广和普及中国知识。目前该院共有 8 个研究室和中心，1 个图书馆、综合行政处和科学与培训管理处，总共 11 个部门，46 名员工。其中，研究人员 39 名。8 个研究室和中心分别为：中国综合研究室、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社会研究室、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室、越中关系研究室和台湾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中国研究院内的图书馆藏有 10,000 多册图书和资料，包括越南语、中、英、俄文在内的 100 多种报刊、杂志。院内所有资料正在进行网络资源化处理，读者可通过英特网快速、方便地查询资料信息。此外，中国研究院还与国内外中国研究单位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新华社驻河内分社以及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各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研究院还得到包括美国福特基金、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等在内的许多国际

1 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

2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3 参考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 1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04 页。

4 后更名为“越南社会科学院”。

5 越南习惯把该院名称翻译为“中国研究所”。

组织驻越南办事处的资助。¹

汉喃研究院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该院成立于1970年, 当时直属于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汉喃部 (Ban Hán Nôm)。1979年9月13日, 更名为汉喃研究院。1993年越南国家社科研究中心成立时, 为其中的一个研究院。汉喃研究院的主要职责范围有: 收集、保存越南国内的汉喃资料; 编译、研究、出版汉喃资料; 培养汉喃研究人员。“据院长郑克孟介绍: 在该院储藏几千部的文献中, 主要是越南古代和中近代的作品, 目前已经翻译成越南文的只有少数几百部, 大量的文献还正在收集、考证和翻译过程中。”² 1993年汉喃研究院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 编辑出版了《越南汉喃遗产目录》, 共收录了5000余种现存于越南的汉喃古籍。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古籍由中国传到越南; 另三分之二的古籍系越南人在中国汉文化影响下撰述的作品。这些古籍是学术界研究汉文化的重要文献, 对越南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院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前身为直属于越共中央的“文—史—地研究室语文组” (Ban nghiên cứu Sử — Địa — Văn), 后于1959年2月正式更名为文学院, 并归入越南国家科学委员会。文学院的职责范围包括: 文学理论、历史、评论领域基本问题的研究工作; 为越南文学全面发展战略、路线的设定提供科学依据; 培养文学方面人才; 推动越南全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目前, 文学院中有9个研究室,

其中的外国文学室中有许多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员。此外, 文学院中的图书资料室也存有大量中国文学研究书籍和期刊。³ 该院在越南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起重要的带头作用。

社科信息院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同上述三个研究机构一样直属于越南社会科学院。该院主要负责翻译、编辑、整理、出版各种书籍、杂志、专题、新闻、领导内参, 图书馆资料信息等, 为越南的社科研究领域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和信息。该院设有图书馆, 其中包含3个汉文、喃字书库, 分别为: 古中国书库、现代中国书库和汉喃书库。古中国书库中主要收录了清乾隆皇帝时期出版的《四库全书》以及少量民国时期至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 共计4600种, 32,000册; 现代中国书库中主要收录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由中国出版的社科人文方面的书籍, 共计11,912册。该库中的书籍涉及哲学、马列主义、文学、史学、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以及各种工具书; 汉喃书库则收录了用汉字、喃字、越南语、法语等文字编写的在越南出版的书籍、资料。目前该库仍保留了大约20,000多册⁴的汉喃书籍。⁵

除上述几个研究单位外, 其他一些直属于越南社科院的如: 历史研究院、哲学研究院等也有部分学者专门从事与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2) 各高校、汉语培训中心

近些年来, 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日益升温, 汉语和有关中国学的基础教学重新被放到重要位置, 一些院校还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主要单位如下:

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 该校的中国学教育比较全面, 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喃等。该校设有中国研究中心, 东方学系中还设有中国学专业。一部分毕业生的去向是越南社会科学院下属各院中国研究相关部门。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2月20日, 主任是阮金山副教授。该中心专门研究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历史、哲学、语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中的问题。中心还十分关注中国在国家建设、文化保护和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管理与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融入国际等方面的经验问题。同时参与中国学人才的培养。⁶

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 前身是河内外语师范大学。该校设有

1 《中国研究院——15年建设与发展》, 河内: 河内社科出版社, 2008年。

2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第498页。

3 笔者于2010年1月亲自走访了该院, 并得知上述情况。

4 越南汉喃研究院成立后, 社科信息院将近16,000册汉喃书籍转交给该院。

5 本段中的数据来自于笔者2010年1月走访社科信息院所调查到的资料。

6 参考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网站, <http://ussh.edu.vn/trung-tam-nghien-cuu-trung-quoc/1033>。

中国语言文化系。在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发展过程中，曾选派 10 多名教师前往中国的高等院校或其他国家大学任教。该系曾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参与编写越南学生学习汉语的系列教材。中国语言文化系每年招收约 100 多名四年制本科生，25 名硕士生。

河内大学：前身为河内外国语大学。主要从事汉语教学。

此外，在越南南方和中部还有一些大学中设有中文系、中文专业和中国研究中心。如：胡志明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东方学系设有中文专业；胡志明师范大学中设有中文系和中国语言文化中心；胡志明外国语信息大学外语系中设有中文专业；岷港大学直属外国语大学中设有中文系等。

综上所述，目前越南的汉语教学非常盛行，几乎所有设立外语教学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汉语专业，并且发展势头迅猛，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

此外，越南全国大约有 100 万华人，50% 以上居住在胡志明市。这里的一些中学开设了汉语课程，社会上也开设了许多汉语培训中心。

（二）越南中国研究取得的成果

“由于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院是越南目前研究力量最为雄厚，研究范围最为全面的官方正式研究机构”，该院近些年来出版的研究成果和进行的主要研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越南当今的中国研究成果，因此本论文以中国研究院为代表，介绍当前越南

中国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

1. 主要研究项目¹

自 1993 年成立以来，该院获得大量的国家级、部级研究项目，具体如下：

（2007—2009）国家级项目：

◎ 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管理模式对于越南的启示和意义；

◎ 一些东亚国家的人类与文化发展给融入国际过程中的越南提供的经验。

（2007—2008）部级项目：

◎ 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60 年中共发展思维中的一些基本突破；

◎ “富民兴边”政策及其在中国西南边境各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执行过程；

◎ 澳门回归中国：现状与展望；

◎ 香港回归中国 15 年：现状与展望；

◎ （1981—1990）越一中关系中的一些大事件；

◎ 中国关于东亚合作的观点、主张和政策；

◎ 1978 年来中国的人才战略及为越南提供的一些经验；

◎ 中国与公民社会建设；

◎ 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5 年来

的评价；

◎ 中国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2. 主要研究著作²

1993—2008 年，中国研究院共出版了 41 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主要包括：《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越南—中国关系》、《2007—2008 年中国》、《中国研究道路》、《中华特色》、《中国研究院：15 年建设与发展（1993—2008）》、《中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2006—2007 年中国》、《1978—2003 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国际背景下的外交》、《苏东坡诗句中的艺术风格》、《曹禺戏剧艺术》、《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的用兵方法》、《中国研究：一些经济和文化问题》、《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台湾经济奇迹》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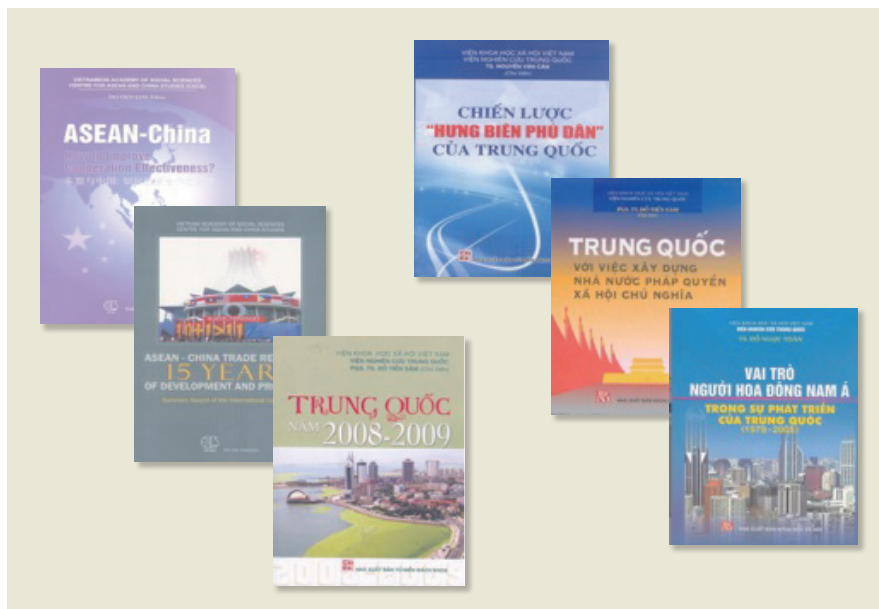
3. 定期出版物

在越南的中国研究领域有两本定期出版的杂志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分别为《中国研究》和《汉喃杂志》。

《中国研究》杂志：由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主办，这是越南国内唯一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杂志。1995 年 6 月开始发行季刊，后改为双月刊。到 2008 年底已发行 88 期，刊登了 800 多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论文。目前，该杂志设立的主要栏目有：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历史—文化、

1 参考《中国研究院——15 年建设与发展》，河内：河内社科出版社，2008 年。

2 《中国研究院——15 年建设与发展》，河内：河内社科出版社，2008 年。



港澳台地区、中国学常识、典故和历史传说、动态信息等。此外，该杂志每年还发行英文版一册。

《汉喃杂志》：由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主办，1995年6月开始发行季刊，现为双月刊。2009年，该杂志共刊登了61篇文章和动态信息：

其中41篇为研究性论文；6篇读书体会；8篇参考资料收集情况；6篇汉喃常识及动态信息。¹

4. 主要活动

近年来，越南社会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与中国相关单位建立了交流关系。每年都有两国科研人员互访，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进行资料交换。

越南社会科学院举办了多场关于中国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例如：2007年9月24、25日（于河内市）和27、28日（于胡志明市），越南社会科学院联合越南政府入世技术援助项目组共同举办了题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5年：与越南分享经验”的研讨会。2007年10月30、31日两天，越南社会科学院联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题为“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中越两国经验”的国际研讨会。2007年12月2日，在越南老街省沙巴市（Sapa），越南社会科学院与老街省人民委员会共同举办了旨在寻找措施来推动中越两国“两廊一圈”建设、发展事业的国际研讨会。2008年8月23日，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主持召开了题为“东亚各国文化与人类的发展——越南融入国际过程中的经验”的研讨会。2008年12月16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与经验”主题研讨会在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的会场胜利落幕。

目前，中越两国许多高校都建立了“3+1”的合作办学模式。比如，越南的汉语专业或中国的越南语专业的学生可在本国学习三年，到对象国学习一年的时间。

（三）有待改进的问题

1. 长期以来，变动中的中越关系直接影响了越南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对中国研究观点的表达。越南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的描述和对中越两国关系的研究需转向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夸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不论适不适合本国国情，一味地效仿中国；也不能过度放大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2. 当前，越南薄弱的社科研究能力使其中国研究受到影响。多年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儒家思想的深层影响、政治和战时研究的需要，所

1 引自越南汉喃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www.vass.gov.vn>。

有这些因素使得越南社会科学到目前才开始形成知性的创造性。从1954年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越南才进入批判性、分析性社会科学阶段。¹

3. 目前,越南国内的中国研究人员处于“青黄不接”时期。老一辈精通儒学的研究学者,如邓泰梅、陶维英、高春辉都已过世;一些精通汉学、通晓古汉语的史学、文学、语言学教授也年事已高。在中越两国关系恶化的那段时间里,大部分中国研究人员都转行,从事其他专业的研究了。尽管目前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空前发展,但他们很难再次“转行”,因此中国研究队伍中缺少了中间的一代人。如果放眼越南社会科学院下属各院和社科人文大学各系,就会发现60%—70%以上的都是年轻人。越南古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东方哲学研究者如果不精通汉学、不懂古汉语将如何进行研究?越南学者自己也承认,现在越南各高校中的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专业以及各专业研究院中国学研究人员培养工作虽得以恢复,但效果仍十分有限。²

4. 与汉语专业或从事中国研究人员比例相比,目前能够得到中国或越南政府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的人数太少。而且,在已获得政府奖学金的人员中,短期留学人员占很大的比例。他们在中国短期的留学生活里,只能尽量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并不一定能成为某一领域内真正的中国学家。

5. 在研究题材方面:当前越南国内的中国研究过度侧重于现代领域,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研究院申请的部级研究项目中没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即便是在现代领域研究范围内,还未有中国民族、宗教相关问题的研究。³

6. 研究成果出版方面:除汉喃研究院、中国研究院和东盟研究院出版的杂志有英文版外,其余研究成果都只用越南文出版,因此很难与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进行交流。

7. 近年来,首都河内和其他城市的中国研究机构碰到的又一个问题是如何吸引和留住合格的专业研究人员。当今越南正处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这为许多会讲汉语的社会科学

工作人员提供了机会,很多研究所和大学现在已难以留住最有前途的研究人员和教师。中国研究院也面临着这种压力,许多研究人员由于政府所付薪水过低,有的辞职“下海”,有的甚至在工作时间通过作兼职顾问或兼课教师“捞外快”。在越南,社科研究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是相当慢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越南自古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其研究领域之广、程度之深在国外的中国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两国关系的波动一度对越南的中国研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自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的中国研究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当然,在该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但笔者相信,随着相关条件的改善,越南的中国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辉煌。

主要参考文献

- 1 参考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 2 阮辉贵:《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越南的东方学——第一届国家科学研讨会纪要》,2000.11.29—2000.11.30,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第295页。
- 3 《中国研究院——15年建设与发展》,河内:河内社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 1 阮辉贵:《越南的中国学研究》,《越南的东方学——第一届国家科学研讨会纪要》,2000.11.29—2000.11.30,河内国家大学——社科人文大学。
- 2 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3 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
- 4 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5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
- 6 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7 《中国研究院——15年建设与发展》,河内:河内社科出版社,2008年。
- 8 张加祥、俞培玲:《越南》,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国际亚洲研究所¹



国际亚洲研究所（英文全称为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简称 IIAS）是由荷兰皇家科学院（KNAW）、阿姆斯特丹自由（Vrije）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莱顿（Leiden）大学于 1993 年共同建立的博士后研究机构。它的财政经费主要来自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国际亚洲研究所主要开展有关亚洲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

国际亚洲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亚洲研究，促进该领域的国家和国际科学合作，推动亚洲研究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活动的发展。研究所作为一个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站在联系不同国家合作者中发挥了灵活的协调作用。其活动包括提供信息服务、建立国际网络、提出国际合作项目和研究计划，以及为荷兰和国外学者提供在该所（或荷兰国内外类似机构）内进行合同研究的机会等。

博士后研究人员是该研究所根据合作研究计划或个人临时聘用或隶属于这个部门的成员。国际亚洲研究所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大型会议，出版简报，并建立了欧洲与世界范围的亚洲研究学者和当前研究信息的数据库。1998 年出版了《欧洲的亚洲研究指南》（该数据库的印刷版本）。

1997 年，国际亚洲研究所与位于哥本哈根的北欧亚洲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国际合作联盟。成立该联盟的目的是增强对当代亚洲的研究，建立亚洲与欧洲机构和人员的交流网络。

1998 年 10 月，在该所与北欧亚研究所于汉城联合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形成了“欧亚研究联系计划（PEARL）”。为了增进这个领域的合作和学者交流，该研究所还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奥地利、俄罗斯、越南、巴基斯坦、中国、法国、朝鲜、菲律宾等国的 20 余个研究机构签署了理解备忘录。

国际亚洲研究所近期完成的研究计划或项目包括：“变革中的亚洲劳资关系”、“20 世纪宗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社会组织”、“亚洲的表演艺术：传统与创新”、“跨国社会、媒介与公民权利和义务”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艺术与考古学文献索引”。在 2000—2001 年期间，由国际亚洲研究所组织和由欧洲科学基金会亚洲委员会资助的学术研讨会与讲座有：“亚洲的电影”、“城市、郊区和边缘地区：东南亚岛屿经济地理的变化”、“1900—1960 年东南亚的日本商业网络”、“东南亚大陆的王族及其历史发展”、“东南亚的跨国伊斯兰教”、“第二届国际亚洲学者大会”等。

联系方式：

Postal address:

IIAS, Main Office, Leiden
P.O. Box 9500,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el: +31-71-527 22 27

Fax: +31-71-527 41 62

Email: IIAS@iias.nl

Website: <http://www.iias.nl/>

1. 本文转载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7768.htm>。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韩慧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